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

· 中国西南民族志丛书 ·

何 明◎主编

“地方性”的尝试

云南回族特殊族群民族认同、族群关系及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冯 瑜 赵卫东 李红春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本书受以下项目及单位资助出版：

云南大学“211工程”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云南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群）建设项目“中国西南民族及其与东南亚的族群关系研究”成果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省民族文化多样性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研究”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回族多元宗教文化研究”成果

云南省民族研究院

“地方性”的尝试

——云南回族特殊族群民族认同、 族群关系及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冯 瑜 赵卫东 李红春 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责任编辑：纪萍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方性”的尝试：云南回族特殊族群民族认同、
族群关系及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 冯瑜，赵卫东，李红
春著.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10

ISBN 978-7-5130-1200-3

I. ①地… II. ①冯…②赵…③李… III. ①回族—
民族历史—研究—云南省 IV. ①K28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7484 号

“地方性”的尝试——云南回族特殊族群民族认同、 族群关系及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DIFANGXING DE CHANGSHI: YUNNANHUIZUTESHUZUQUN
MINZURENTONG ZUQUNGUANXI JI SHEHUIWENHUABIANQIAN
YANJIU

冯瑜 赵卫东 李红春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010-82000860 转 8387

印 刷：北京富生印刷厂

开 本：720mm×960mm 1/16

版 次：2012年10月第1版

字 数：268千字

邮 编：100088

邮 箱：bjb@cnipr.com

传 真：010-82000860 转 8240

责编邮箱：jpp99@126.com

经 销：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印 张：17.75

印 次：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3.00元

ISBN 978-7-5130-1200-3/K·117 (4070)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编委会

主 编 何 明

副主编 陈庆德 周 平 杨 毅
李志农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居里 马翀炜 李东红

李志农 李丽双 李晓斌

陈庆德 何 明 杨文辉

杨 毅 张 跃 周 平

桂 榕 高志英 瞿明安

总 序

何 明*

经过众多学者和学生的辛勤工作,《中国西南民族志丛书》^①开始面世。为了让读者获得更多的信息,现将丛书研究的范围、方法和宗旨等作一介绍。

一、研究范围:中国“西南”辨析

“西南”是一个具有多项意指的范畴。最初也是最基础的含义为地理空间,指中国的西南部,但其边界在何处是不确定的,具有模糊性。以此为基础,衍生出所指各不相同的语用。

其一是文化空间或族群地域分布意义上的西南。西汉时出现了“西南夷”这样一个融合地理空间与文化空间为一体的族群概念,所指范围大致包含今云南全省、贵州西部、四川西部和南部以及甘肃南部地区的族群及其政权。1930年,梁钊韬先生绘制出《西南民族分布与分类略图》^②,将西南的界限明确化,其范围包括当时的云南、四川、西康、西藏、广西、湖南的湘西以及广东的海南岛、青海玉树和甘肃甘南等地,可视之族群地理概念的广义语用。与之相较,方国瑜先生所运用的西南概念所包含的范围却小得多,所指“即现在云南全省,又四川省大渡河以南、贵州省贵阳以西”^③。

其二是行政区划或行政管理空间上的西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国

* 作者简介:何明(1959~),男,浙江义乌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南民族研究和艺术人类学研究。

① 项目来源:“西南工程”项目“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实证研究”;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边疆民族心理、文化特征与社会稳定——西南部分”。

② 此图原件现存于四川大学博物馆。

③ 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见《略例》,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页。

家与省（市）之间按地理空间设置“地方局”的管理机构，将全国分为华北、华东、华南、东北、西北、西南等片区而分属各局管理，其中西南局于1949年11月23日在湖南常德成立，后驻地迁至重庆，辖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六省区市（后西康和重庆划入四川）。其后，地方局即大区体制几经废置，至1966年撤销后再未恢复，但其所形成的区域划分模式影响深远。

其三是区域经济意义上的西南。由于川、滇、黔、桂、藏五省区在地理上相接、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经济交往密切，故于1982年成立了“西南经济协作区”。

其四是政策上的西南。1999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除了川、滇、黔、桂、藏、渝省（市、自治区）整体纳入西部大开发范围之外，与之相接壤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也列为享受西部大开发待遇的地区，由此西南的概念在一些语境下包括川、滇、黔、桂、藏、渝省（市、自治区）及湘西和鄂西两个自治州。

1981年成立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率先采用行政区域的标准，吸收云南、四川、贵州、西藏、广西五省区的民族学者为会员。“西部大开发”政策出台后，会员的组成范围扩展到湖北和湖南，兼顾了国家政策和民族分布两个标准，其范围略小于梁钊韬先生的《西南民族分布与分类略图》。

国外学术界对上述区域的认识与划分同样存在差异。仅从近年来被国际学术界炒得沸沸扬扬的“zomia”^①概念来看，它“悬置”现代国家的边界而将东南亚高原地区以及与之相连接的中国部分区域视为一个整体，但在将现中国哪些区域视作“zomia”范围的问题上意见却不一致。此概念的提出者荷兰学者 Willem van Schendel 所划定的范围是从喜马拉雅山脉的西侧和西藏高原到中南半岛的高原地区。^② 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 James C. Scott 所划定的区域为从印度以北至越南北部，包括现中国云南、贵州、广西的全部及四川的部分和

① “zomia”源于Chin族语词“zo-mi-a”，含义为边缘人。

② Willem van Schendel, “Geographies of Knowing, Geographies of Ignorance: Jumping Scale in Southeast Asi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 6 (2002): 647~668.

东南亚高原，相当于 Schendel 划定的范围的东半区。^①

尽管“西南”所指范围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和不同语境下存在着差异，但云南全省以及四川和贵州邻近云南的部分始终未被排除在外。综合上述各种划分标准，同时兼顾可操作性，本套丛书的研究范围以云南为中心并涵盖贵州、广西、四川和重庆等中国西南的5个省（市、自治区）。

二、转型与深化：中国西南研究历程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西南即纳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此后，西南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人的关注，并随着西南、中国、世界格局和学术的变迁而不断演化。纵观中国西南研究的漫长而复杂的历程，至今大致存在着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末以前）：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下的西南记述。

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史志传统，不同地区和群体的社会文化差异备受关注并被学者所记述与研究。早在西汉前期，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中设有《西南夷列传》，根据其周游经历和所收集到的文献，较为翔实地记述了西南的社会文化形貌，开创了中国古代正史记述西南的先河。其后史官相沿不衰，形成《二十四史》用记传体记述西南的系统文献。记载西南山川、风俗、特产等的“地志”为另一类非常重要的文献，如《华阳国志》、《元和郡县图志》等。此外，《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史书、《西南夷本末》等纪事本末体史书、《南诏野史》等野史、《通典》等专门记述典章制度的“政书”、《太平御览》等“类书”、《徐霞客游记》等被列为“集”类的文献，可谓典籍浩繁、汗牛充栋。中国传统学术以“述而不作”的方式研究西南，记述作者所见所闻，将其考订、分析、评判等研究融于叙事之中。

第二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术体系下的西南考察。

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国门被西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洞开，与中国西南接壤的东南亚和南亚纷纷沦为英、法殖民地，日本开始觊觎这片富饶的土

^① James C. Scott,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 Preface, ix,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地。在这一过程中,一批西方和日本的业余学者及少数学者开始进入中国西南地区进行考察,如英国人丁格尔(Dingle)在清末由上海到缅甸,途中经过西南地区,对于西南汉族、苗族、彝族、白族等民族的婚姻、服饰、丧葬等都亲自观察,将这段经历写成了《丁格尔步行中国记》^①;英国商人立德(A. J. Little, 1838 ~ 1908)在19世纪末到川边及云南等地活动,著有《峨眉山及峨眉山那边:藏边旅行记》(Mount Omi and Beyond: A Record of Travel on the Thibetan Border, 1888)和《穿过云南》(Across Yunnan, 1910);英国驻重庆、腾越领事烈敦(G. J. L. Litton, 1870 ~ 1906)撰写了《中国:川北旅行报告》(China: Report of a Journey to North Ssu-chuan, 1898);英国印度殖民局官员戴维斯(H. R. Davies)从1894年到1900年间多次到云南调查,对彝族、苗族、藏族等民族的地理环境、语言、习俗等作了调查,撰写了《云南:印度和扬子江流域间的链环》^②;日本学者鸟居龙藏于1902年7月至次年3月受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院派遣到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省考察中国西南民族的分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各民族的体质、服饰、居住、习俗、语言、文化等,以此次调查为基础撰写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和《苗族调查报告》^③等著作;法国军医吕真达(A. F. Legendre)调查研究了彝族并发表了《罗罗人的人种学研究》(1909)和《建昌罗罗》(1911)等文章;美国人葛维汉(D. C. Graham)在20世纪20~30年代先后对羌、苗、藏等民族聚居区进行了多达14次的调查;美国人洛克(J. F. Rock)对纳西族和藏族的调查等。这些调查研究尽管带有殖民主义的色彩,但开创了运用现代科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西南的先河。

中国学者第一次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实地调查为英国剑桥大学和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的丁文江(1887~1936)于1911年在云南和四川的调查,著有《云

① Dingle 著,陈曾谷译:《丁格尔步行中国记》,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

② H. R. 戴维斯著,李安泰等译:《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③ 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和《爨文丛刻》。之后，四川都督府于1912年组织了对四川的峨边、马边、雷波和云南的屏边4县彝族地区的调查，其后出版了《峨马雷屏边务调查记》和《三边屯务调查图说集》。1934年起，民国政府教育部拨出专款在金陵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校设立边疆史地的讲座^①并组织了多次边疆教育考察。这些考察是在接受了西方学术体系影响之下进行的，但其根本目的是救亡图存，与上述西方和日本学者恰恰相反。

在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创立之初，西南便成为重点研究区域之一。1927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编辑出版《西南民族研究专号》，中山大学杨成志等学者于1928年到云南进行了一年多的民族考察，1933年中央研究院凌纯声、芮逸夫等赴湘西调查，拉开了西南研究的序幕。

第三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末）：西方学术体系下的西南民族志研究。

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经过十多年的建设至20世纪30年代开始趋于成熟，西南研究从以田野考察为主的范式向具有一定深度的民族志范式转变。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赴湘西调查苗族后出版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一书，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志的早期典范。至30年代后期，抗日战争的爆发迫使内地的高校、科研机构及大批学术精英迁至昆明和成都，掀起西南研究的热潮，完成了费孝通和张之毅的《云南三村》、许烺光的《祖荫下》、林耀华的《凉山彝家》、马长寿的《凉山罗彝考察报告》、徐益棠的《雷波小凉山之僮民》、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方国瑜的《滇西边区考察记》、江应樑的《摆夷的文化生活》和《滇西摆夷的现实生活》、李安宅的《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吴泽霖的《贵州苗彝社会研究》等一批经典性的民族志作品。同时，在滇、川还有《边政公论》、《民族学研究集刊》、《西南边疆》、《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边疆研究周刊》等学术期刊发行，刊发以西南研究为主的学术成果，

① 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下半年度教育部工作计划》，教育部1948年印。

创造出重要研究黄金期，完成了人类学来到西南，形成了西南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高峰，并初步形成了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格局。

但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后高校和学者的回迁、国家政权的更迭，西南研究的蓬勃发展态势没有得到延续，特别是民族志研究的传统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继承。

第四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末）：配合国家建设与社会变革的西南民族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政权建设和社会变革的需要，国家组织全国的学术力量开展了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大调查，其后编写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即“中国少数民族”、“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民族简史”、“民族语言简志”、“民族自治地方概况”）。西南民族研究成为此阶段民族调查研究的重点之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边疆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顺利实施和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尽管从今天的学术视角来看，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大调查无论在理论预设上还是在方法上都存在着一些可圈可点之处，特别是把社会形态进化理论作为唯一目标限制了研究的成效，但毕竟奠定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人才基础和资料基础，所形成的调查资料至今仍被国内外研究者征引。

第五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全面推进与多元发展的西南民族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恢复重建过程中，西南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成立后于1982年组织藏彝走廊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开启了以西南学者为中坚力量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之后，具有西南研究传统的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等高校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重建过程中把西南作为重要研究区域之一，云南大学等西南地区的高等学校开始启动与推进民族学/人类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国际学术交流频繁，学者互访、国际学术会议进入常规化，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次大会于2009年7月在昆明成功举行。西南研究进入繁

荣发展的阶段，并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全面推进。作为民族学/人类学的基本方法，田野调查在西南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以西南地区学者为主体开展的大型专题调查研究有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南昆铁路沿线、三峡库区、三江并流区、藏彝走廊等，综合性调查有云南大学组织的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和中国少数民族农村调查等；西南少数民族的族别研究和特殊汉人群体研究兴起，建立了族别研究会，涌现出族别研究专家，推出系列调查研究成果，相继提出藏学、彝学、苗学、壮学、傣学、瑶学、纳西学、哈尼学、傈僳学、怒学等学科建构设想，贵州屯堡人和四川汉人等也受到学界关注并开展相关调查研究；纳西东巴文化、彝族毕摩文化、傣族贝叶文化等特色文化研究取得进展；出版的大型调查研究成果有“西南研究书系”、“云南民族村寨调查”、“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历史民族志研究”、“新民族志实验丛书”等。此外，理论方法研究、民族历史研究、专题研究、应用研究等亦不断推进。

二是理论方法的多元化。随着国外现代学术思潮和理论方法的传入、在国外学成归国学者与国际交流的频繁、国外学者进入西南开展田野调查的增多，西南研究呈现出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特征。在理论模式上，有沿用社会进化理论者，有重新援用结构—功能论者，有引进结构主义理论者，还有用现代性和后现代研究西南者；在研究论题上，有调查研究摩梭人的婚姻家庭者，有调查研究少数民族变迁者，有研究民族关系者，有研究文化与生态关系者，有探讨中华民族的主体架构者，有探索文化建构和民族认同者，有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和旅游开发者，有研究西南都市少数民族者，有研究文化空间和家屋者，有研究宗教和仪式者，还有研究“人观”者；在方法论上，有的采用单点田野个案方法，有的采用多点田野个案方法，有的对前辈学者田野点进行回访，有的进行文化持有者“主位”叙述的试验，也有一批学者运用文献进行研究；在推动分支学科发展和理论研究上，尹绍亭的生态人类学调查研

究、陈庆德的经济人类学理论建构、周平的民族政治学和边疆治理的理论研究、王文光对民族史的开拓、何明及其团队在艺术人类学的理论探索和田野实践、瞿明安的象征人类学阐释与应用、张晓萍和杨慧的旅游人类学译介和研究等，均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三是研究主体的本地化。随着西南地区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建设的进展和人才培养能力的提高，西南本土研究力量不断增强，包括少数民族学者在内的一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研究队伍迅速壮大，从而成为西南研究的主体力量，改变了西南研究的主要力量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以外国人为主、20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以外地人（西南地区以外的中国学者）为主的格局。本地学者、本族学者的“文化自观”，与国外学者、外地学者的“文化他观”，逐渐形成“自观”与“他观”之间的交流对话，推动着中国西南研究的繁荣与进步。

三、中国西南研究的关键：提升民族志研究的水平

“民族志”（ethnography）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作为作品的民族志，即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写作的文本；其二是作为过程的民族志，即田野工作（Fieldwork）^①。前者依赖于后者，没有文本撰写者的田野工作过程和调查内容记述，就没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族志作品；但民族志文本却不等于田野工作，不是对田野调查内容的简单记述，而是以田野工作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的产物。

民族志是现代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生产的核心产品。在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领域，民族志被视为古典人类学与现代人类学的分野，前者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或“书斋里的人类学”：学者们不从事系统的田野工作，其学术成果也不是通过民族志的方式表达，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的资料来源大都是旅行家、传教士、殖民者、船员等曾目睹过异文化的人士所撰写的文字资料和历

^① Alan Barnard and Jonathan Spencer,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p19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lor & Francis Group, 2005.

史档案文献，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们不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不撰写系统的民族志。从19世纪末起，文化人类学开始从古典向现代转型，其标志便是英国动物学家兼人类学家哈登（Alfred Cort Haddon）在1898～1899年两次率领剑桥大学的考察队赴托雷斯海峡进行田野调查并完成了六卷本的调查报告和英国功能主义的代表性人物马林诺斯基（B. K. Malinowski）通过1914～1918年之间三次到新几内亚进行调查所撰写的民族志作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此后，民族志成为现代民族学/人类学必不可少的核心性工作，并成为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基本学术范式。其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它将先前主要由业余学者或其他人员在非西方社会中进行的资料搜集活动以及由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专业人类学者在摇椅上进行的理论建构和分析活动结合成一个整体化的学术与职业实践”^①。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田野调查和民族志通常被视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学术方法特质，尽管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经现代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发明并规范之后被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众多学科所援用，但没有哪一个学科像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那样把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当做不可或缺的学术实践，也未能像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那样建构了如此系统的田野工作范式和完成了如此之多的民族志经典文本。

民族志是民族学/人类学学术创新的基础和关键。社会文化的描述与理论解释是民族志缺一不可的要素。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总结自己对花蓝瑶和江村的两次调查时深刻地指出：“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作导线，所得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我虽然在这一堆材料中，片断地缀成一书，但全书并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所有的事实全部组成在一个主题之下，这是件无可讳言的缺点。”^②只有抽象理论论证而没有深入细致的田野资料的学术文本，是“演绎理性”的理论论著，而不是民族志，至少不是令人信服的有价值的

① [美] 乔治·E. 马尔库斯、米开尔·M. J. 费彻尔著，王铭铭、蓝达居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页。

②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民族志；只有社会文化资料的排列堆砌而无周密系统的思想观点或理论解释的文本，只能视为“调查资料”，最多称之为“田野报告”，而不是民族志，至少不是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民族志。从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互动理论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后现代人类学，每一次学术流派的更迭创新，都是围绕着民族志展开的。没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翅》等民族志，就没有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

云南大学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曾经是组织中国西南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学术实践的重要机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办人吴文藻先生在 40 年代初与燕京大学合作创办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研究室（因抗日战争期间曾迁到昆明近郊呈贡县魁星阁而被称为“魁阁”）。“魁阁”组织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撰写工作，完成了《云南三村》、《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等一批中国早期民族志研究的经典作品，创造了中国西南研究的鼎盛时期。在民族学/人类学恢复重建之后，云南大学先后组织了“跨世纪云南少数民族调查”、“中国少数民族村寨调查”和“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调查”三次大规模的田野调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从“书斋”转向“田野”。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科水平和研究质量，云南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科进一步推动田野工作从“民族调查”向“民族学调查”转变，力求催生出田野调查扎实细致、讨论学术前沿论题、解释严谨深入的研究西南的民族志作品。本套“中国西南民族志丛书”便是这一学术追求的结果。

当然，学术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优秀的民族志也不可能呼之即来。纳入“中国西南民族志丛书”的作品，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必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缺陷。“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只有把它呈现在读者面前，接受国内外学界“公婆”的批评指导甚至“当头棒喝”，才能改进与提升。

目 录

Content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开创与挑战	2
第二节 命名与困惑	3
第三节 书写与拓展	4
第四节 跨越与创新	7
第五节 地方性与再认识	9
第六节 结论与反思	11
第二章 云南回族特殊族群概述	13
第一节 云南回族及云南回族特殊族群的形成	13
第二节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云南回族特殊族群	16
第三章 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与适应——西双版纳“帕西傣”	18
第一节 从两份家谱看“帕西傣”的形成	19
第二节 帕西傣的宗教文化	29
第三节 帕西傣独特的民族宗教心理	49
第四节 族群关系视野下“帕西傣”婚姻状况的调查分析	55
第五节 余论	62
第四章 族群边界理论视野下的大理“白回”研究	70
第一节 “白回”族群的族源追溯	74
第二节 “白回”族群的族群边界	89

第三节 维系“白回”族群边界的主要文化因素	129
第四节 结论	137
第五章 迪庆“藏回”的社会变迁研究	145
第一节 回族迁徙和云南“藏回”族群的形成	145
第二节 “藏回”族群的经济与社会文化	159
第三节 哈巴“藏回”族群社会文化的变迁	173
第四节 “藏回”族群的认同及“他释”	180
第五节 “藏回”族群社会文化变迁思考	191
第六节 人类学视野中的“藏回”族群社会文化变迁	199
第七节 结语	205
第六章 玉溪新平与宁蒗小凉山地区的“彝回”	210
第一节 玉溪新平高粱冲、扒枝里“彝回”族源的历史叙述	210
第二节 高粱冲、扒枝里回族彝化分析	213
第三节 高粱冲、扒枝里回族的宗教文化复兴之路	216
第四节 小凉山彝族的迁居史	226
第五节 回族进入宁蒗和永宁地区的历史	228
第六节 历史上回族与宁蒗小凉山少数民族的交往与互动	232
第七节 宁蒗小凉山彝族地区回族经济发展状况	234
第八节 宁蒗小凉山彝族地区回族宗教文化发展及现状	236
第七章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壮回”	242
第一节 文山州回族人口及源流	242
第二节 文山州回族社会经济生活	244
第三节 文山州的“壮回”	250
附录	258
后记	264

第一章 绪 论

以往对中国回族的研究，无论是西方学界还是国内学界，常常倾向于将回族作为一个整体，纳入思考的范围，把回族当做具有高度同质化的群体或伊斯兰-回族文化共同体来展开研究。“西方学界对中国的研究和中国学界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同样贯穿了这样的结构，即对‘民族’的同质化想象。研究者将‘民族’或‘族群’视为同质的文化或族裔共同体，想象他们具有共同的文化或族裔特征”^①。这种以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构和普遍规律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同时也是研究的落脚点的方法论取向，被叶舒宪看做是一种“普遍主义”的方法论，他认为“六十年代，结构主义的出现使人类学中的普遍主义再度复兴，并且影响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方法论取向”^②。这种方法论在中国回族研究中的体现，则是长期以来对中国回族文化结构和发展规律的同质化的书写与建构，从而忽略了中国回族内部的差异以及地方特色等一些基本事实。作为对当时以结构人类学为代表的普遍主义方法论的回应，格尔茨在其著作《文化的解释》（1973）中表达自己的文化研究观点时说：“我主张的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semiotic）概念，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于是，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③沿着这样一种文化研究的思路，格尔茨在10年之后发表的《地方性知识》（1983）一书中进一步提出“地方性”（local）知识的概念，关注人类群体中具有文化特质的地

① 丁克家、马雪峰：《世界视野中的回族》，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2页。

② 叶舒宪：“地方性知识”，载《读书》2001年第5期，第121页。

③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